airiti

政大史粹第 32 期
2017 年 9 月，頁 37-56
DOI: 10.30384/CHNCCU.201709_(32).0002

1940年代國民政府鄉鎮造產探源

許惠文*

鄉村建設運動盛行於1930年代，而鄉鎮造產卻是1939年新縣制推行後的產物。不論是深耕地方有成的新桂系，或者苦思如何強化地方的國民政府，鄉村建設派都是兩者請益的對象。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推動地方建設時，也與鄉村建設派等人的往來與合作。本文即欲探討1930年代鄉村建設運動與鄉鎮造產之間的關連，比較兩者間在鄉村基層運作的淵源與異同。

關鍵詞：鄉鎮造產、鄉村建設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airiti

一、前言

地方基層組織對歷代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如周之比鄰法與井田制度、漢之鄉亭制、唐之保鄰、宋之保甲與明之里甲。同樣的民國時期，縣以下的行政組織一樣是政治上很重要的課題。1928年國民黨完成北伐後，宣布從軍政進入了訓政時期，各項訓政政策陸續開展，在地方自治部分，1929年國民政府公布了縣組織法與縣組織施行法，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訓政時期完成縣自治實施方案，並根據方案制訂了「內政部主管事務分年進行程序表」；以及1934年通過縣自治法及縣自治施行法等，然而各省狀況不一，加上國內外局勢因抗戰而有所不同，因此又修正了縣組織。[1]1939年國防最高委員會制定了縣各級組之綱要，再次對縣以下行政機構改造。鄉鎮造產源自於新縣制的制度，配合地方自治的施行而開展地方自籌財源的造產計畫。

對執政者而言要處理基層問題，首當其衝就是中國農村的問題。中國農村的落後是普遍的認知，不論執政者或者社會關懷者都孜孜不倦盼能解決農村貧窮問題。1930年代前後的政治秩序動盪，軍閥爭戰頻仍，農村歷經了天災與爭戰不斷的人禍，大量的農業人口因戰亂和災荒大量離失，農村金融枯竭。在知識份子的眼中，經濟落後的農村甚至衛生欠佳、陋習遍存。懷抱著救農及救國理想的知識份子，遂投入了鄉村建設的行列中，並在1930年代成為一股風潮。

---

[1] 〈新縣制之實施〉（中央電台1940年2月23日廣播稿），引自《新縣制之理論與實際》見張研、孫燕京編著，《民國史料叢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第140冊，13。

airiti

鄉村建設運動盛行於1930年代，而鄉鎮造產卻是1939年新縣制推行後的產物，兩者相隔十多年，看似無直接關聯，實則不然。筆者在探究鄉鎮造產的緣起時，發現有些廣西省新桂系中推動廣西建設的相關人員，在抗戰時期進入了國民政府建設四川的行列中，例如新桂系如黃紹竑擔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時，與鄉村建設派等人的往來與合作。再者，白崇禧也曾請晏陽初等人至廣西指導，可見鄉村建設與國民政府地方自治的縣政體制中有值得探究的空間。本文即欲探討1930年代鄉村建設運動與鄉鎮造產之間的關連，比較兩者間在鄉村基層運作的淵源與異同。

二、民間自發的鄉村建設運動

不論是民間鄉村建設的實驗或者是政府地方自治的推動，兩者皆是對基層地方都有不容忽視的注重態度。知識份子感於中國農村的落後，主張以建設鄉村，以提高識字、文化教育、農作物改良、改善衛生、建置合作組織及加強農村自治能力等鄉村建設的目標。鄉村建設大致上皆以一個農村或數個農村畫為一區，目的在改進農村環境與生活。鄉村建設工作大概說來分為四方面：一為教育，一為衛生，一為政治，一為農業。如推動四大教育：文化教育、生計教育、公民教育及衛生教育。教育的方式則採學校式教育、社會式教育及家庭式教育。除了普及識字等教育目標外，農業方面如農業品種改良、農業技術改進；政治方面則以自治自衛為主要內容；衛生方面，主要透過學區制度建立衛生管理制度。目的在實驗出一套可以重建中國鄉村，培育新農民。透過成功實驗的模式再推展到全國各地。

airiti

民間的鄉村建設實驗可追溯自1905年米迪剛及米階平於河北定縣的翟城村進行的實驗，但為個案未引起普遍的注意。隨著民國建立後對於地方自治的提倡，基層政治不容忽視之下，各地紛紛進行小規模的社區實驗，其中，有1909年盧作孚在四川北碚峽防團務局實驗、1925年孫以軒河南安陽中山村實驗、1926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在江蘇昆山徐公橋的實驗、1928年沈玄廬浙江蕭山之東鄉自治會、彭禹廷河南鎮平的實驗縣、1929年唐紹儀的廣東中山實驗縣、1930鈕永建上海俞塘改進區、1931年梁漱溟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之鄒平實驗縣等等，皆盛極一時，自此1920年代至30年代各地皆陸續有實驗性的鄉村建設，建設鄉村、復興農村等口號瀰漫全國。

由於各地自發而起，不同區域的鄉村建設內容也就不盡相同。如平教會在河北最初是提倡識字運動，再擴大到從事農村各種工作，如農業、衛生及合作等方面，並提倡四大教育以求解決中國基本的愚窮弱私。至於燕京清河則由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持其建設工作，主要工作為社會服務、農業村經濟、農村衛生及農村調查。鎮平與內鄉兩地則因盜匪猖獗，故由自衛方式，辦理民團，發展鄉村事業。河南村治學院則是受河南省政府委託而設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則為河南村治學院的後身，梁漱溟後為該學院院長，實驗區由鄒平擴充到14縣。青島則是由市政府成立鄉村建設辦事處共5處，並由政府指定主事者，其工作事項由市政府各局計畫施行，大概分為工務、社會、教育、工安及農林5項。華中部分主要為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省，以富政教三者合一，以改進農民生活。目標為自養養人、自治治群、自衛衛國。[2]

[2] 詳見陳序經，〈鄉村建設運動的史略〉，《鄉村建設運動》，收入張研、孫燕京編著，《民國史料叢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第686冊，2-15。

airiti

因此，上述各地的鄉村建設都雖然都注重農業，但要特別舉出的是青島市。不同於鄒平、定縣是培養人才來創立機關，致力於培養鄉村力量，發展鄉村文化；青島市則以市政府出發，以政府機構的力量去執行。再者，如山西省的村治或者廣西省的民團運作模式，則是以省府機關主動推行，在在都顯示出地方在其鄉村建設中，因主事者與其目標的不同，存在不同的運作方式與面貌。因此，有保衛為主的、推行地方自治的、致力土地村公有、注重農業改良、提倡集體農場或者農業合作等等不同主要目標的鄉村建設。換言之，正因各地方的鄉村建設皆是自主性為出發，所以各鄉鎮也就呈現不同的運作面貌。

晏陽初因歐戰時與華工相處，認識到中國一向忽視平民，因此開啟其「造人」的平民教育鄉村改造事業。自1926年始於翟城縣部份實驗，至1929年定縣全部的實驗。先進行社會調查，並編寫定縣社會調查叢書。再進行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

隨著日本侵華，各地陸續被日軍所占領，各地的鄉村建設也隨日本的侵略而終。隨著國民政府地方自治的需求，以及經營四川為後方根據地的考量，鄉村建設漸漸從學術實驗的階段踏入了與政府合作的階段。同樣的政府也透過與鄉村建設派的合作，強化對於地方鄉村的控制。鄉村建設派如平教會成員也進入的政府機構中，在政府機構中，提供其實驗經驗與知識，提供政府建設鄉村建言。因此隨著各地政府的延攬，如晏陽初等平教會工作人員也就陸續前往四川、湖南及兩廣等地，出生於四川的晏陽初更被延攬回其家鄉擔任四川省政府組織設計委員會副委長長一職，進行全省社會調查。因此日軍的侵略並未讓鄉村建設等工作消失，反而成為了各地鄉村

airiti

的工作人員。[3]

三、從學術教育到政治合作的鄉村建設運動

國民黨人因其地方自治之推行，對鄉村建設成果也諸多注意。國民政府在進入訓政時期推動地方自治時，訓政時期首重內政，內政之要首在地方自治，次則農村建設。[4]政府當局及社會人士，皆有感於此一問題之重要，故在縣政問題與解決方式有所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各地備受注意的實驗運動受到了矚目。

1931年晏陽初應蔣中正的邀請南下，講述定縣工作實況。其後，當時桂系黃紹竑為內政部長，曾至定縣參觀兩日，認為「站在教育的立場來說，確有很多地方是相當成功的」,「在現社會裡，如果離開國家的行政系統想從旁得到政治上的成功，是不可能或是極不容易的。」平教會目的是政治的改革，所用的手段是教育的方法。離開政權的關係是很難達到其政治的改革。希望他們進一步透過政府的關係以期收到更大的效果。[5]時人即有主張，鄉村建設與政府的目標一致「如果平教總會所辦之事業，能得各地黨部與之聲氣相求，引為參考，互相扶持，其推行必事半而功倍」。[6]對鄉村建設者而言，透過中央法令舉辦地方自治也是借力使力的捷徑。

因此，以縣政為實驗運動也納入了討論，1932年第二次內政部在南京召開全國內政會議，晏陽初與梁漱溟等也應邀參加。會議中提出省設立政治社會革新研究院及實驗縣的計畫，通過「各省設立

---

[3] 晏陽初，〈平民教育促進會工作演進的幾個階段〉，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第1卷，388-393。

[4] 黃紹竑，《五十回憶》（上海：上海世界書局，1945），236。

[5] 黃紹竑，《五十回憶》，237。

[6]〈定縣之平教與村治運動〉，《大公報》（上海），1930年1月10日，第2版。

airiti

縣政建設實驗區辦法」。1933年公布共有31條。對實驗村選定規定了必備條件如需要可以代表本省一般情形者；交通便利地位適中者；以前辦理地方自治較有成效者；地方有領導人且能出力贊助者；實驗場所有相當設備者。辦法公布後，如廣東之中山、江蘇江寧、山西、湖南、雲南、河南、廣西等地皆有縣級中選。上述政府選定的實驗之外，梁漱溟的鄒平、荷澤與晏陽初的定縣亦同時進行。在實驗一段時間後，上述實驗縣推行工作經驗去蕪存菁後，成為了實施新縣制的依據，訂定新縣制為各省實施標準。[7]

晏陽初在和蔣中正良好互動與黃紹竑的肯定下，遂投入了與政府合作的一途，鄉村建設邁入了透過政府推展的階段。1933年河北省依據內政部頒布的「各省設立縣政建設實驗區辦法」法令和選定實驗區的條件，設立了縣政研究院，定縣成為自治實驗縣。晏陽初與平教會在定縣的經營，從教育實驗進入了政府推展的階段。身兼平教總會會長的晏陽初應聘為河北省縣政研究院院長，定縣縣長由河北縣政研究院實驗部主任霍六丁兼任定縣實驗縣長。[8]平教會在定縣開始其教育與政治合一之下的實驗縣政建設。一方面繼續平教總會的學術研究與實驗，一方面將理論研究置於實踐上。希冀以定縣為訓練模範，推廣到河北以至於全國。研究院性質為政治的，以定縣作為河北全省之縣政改革的出發點；平教會則是維持其私人創設的教育學術團體，工作完全是社會的、教育的、學術的性質，目的在從人民生活裡研究實驗出一種民族改造的基本方案，貢獻與政府及社會做參考或採用。究竟如何運用政治力量，達到政治學術化，學術事業化的目的，非平教會能兼顧，而需研究院力量去推行與實

[7] 張俊顯，《新縣制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88），47。
[8] 黃紹竑，《五十回憶》，237。

airiti

驗。[9]

隨著日本對華的入侵，河北省境內抗日救亡聲源源不絕，上述的縣民總動員活動也就「抗日」作為主要的革新內容。政治活動以公民服務團為基礎，全縣人民皆為公民服務團團員。將縣政府以下的地方機構，設立鄉鎮建設委員會籌備處，由縣政府就各鄉鎮中有德望之人、熱心公益者組成，負責公民訓練，招收16歲以上男女青年，組成公民訓練班，設大隊長一人、中隊長一人、並設政務經濟教育保健工作隊員。進行自衛訓練、農村建設概說、政治經濟教育保健等常識研究與工作討論，訓練時間為一個月，訓練後即組織公民服務團。公民服務團由全體村民組成，團員依年齡分現役、預備及後備三種。[10]由16歲到35歲受過相當教育或公民訓練之男女青年組成現役公民服務團員主幹。服務團組織以保甲為單位，每單位設一甲團，每甲團設一團長，並設政務經濟教育保健工作團員各一人，餘為普通團員。每保設一保團，保團設保團長一人，秘書一人。保團甲團之間設有中團長，各甲團政務經濟教育保健工作團員分別組成政務經濟教育保健組，各組設正副組長各1人，兼任鄉鎮建設委員會政務經濟教育保健股幹事。保團長、秘書、各組正副組長均由選舉產上。鄉鎮公民服務團成立後，即召集公民大會選舉鄉鎮建設委員會委員。[11]

其中定縣之各鄉鎮公所事地方組織中的執行機關也列入縣政改造的項目，以公民服務團為縣政機構的基礎之下，改設鄉鎮改造委員會代替鄉鎮公所。設委員6至12人，容納當地年長的有力份子，鄉

[9] 《定縣實驗工作提要》（出版地不詳：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4），60-61。

[10] 〈定縣實驗區工作概略〉，《民國叢書第四編》（上海：上海書店，1992），社會科學總類 16 鄉村建設實驗 第三集，225-261。

[11] 〈定縣實驗區工作概略〉，225-261。

airiti

鎮的小學教師為委員兼秘書。經選定之委員會正副主席，由縣政府委為鄉鎮長，賦予政治權力。委員會下分設政務、教育、經濟、保健四股，與公民服務團的四組呼應。另外設鄉鎮公民大會監督限制鄉鎮改造委員會，並由公民服務團透過公民大會方式進行制約鄉鎮改造委員會。[12]

各鄉鎮改造委員會因應而生，並有示範性質，示範各村的目標即為完成縣政機構的程序，促進縣政機構應有的教育設施，充實縣政改造的內容。因此鄉鎮涉有改造委員會籌備處，舉辦公民訓練，成立公民服務團並召集公民大會。自此鄉鎮建設的角色已從民間實驗與教育性質轉為改良政治機構的推手。此之設計與當初平教會的學術教育設計已不大相同。建設組織透過保甲的政治組織縝密地結合，已融入了政治制度概念。然而讚揚支持與鼓勵隨之產生，從各地而來參觀學習的接踵而來，應接不暇。雖然評價不一，但是在當時確為頗負盛名的實驗縣代表之一。

當晏陽初逐漸地體認到鄉村建設可以透過政治的力量來完成其目標，然而其對於政治力量仍帶有學術研究者本身的一種距離感，如拒絕張學良出資組織政黨，未應蔣中正邀請加入政府，甚至在1933年擔任河北縣政研究院院長時，與平教會的會員皆未領政府薪水。所以對於晏陽初而言，鄉村建設中的教育與政治的合流，一方面用政治的力量推動教育工作，一方便運用教育力量造成建設的條件。[13]對於鄉村建設者而言，如何能保持自己的本身的立場，借助政治力量讓實行效果事半功倍，又不過度倚賴且保持距離，是其內部拉扯

[12] 〈定縣實驗區工作概略〉，225-261。

[13] 晏陽初，〈十年來的中國鄉村建設〉，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1卷，564。

airiti

的主要課題。以晏陽初等人的平教會到了定縣後就體會到的地方勢力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覺得固有的縣政不良將使他們的工作事倍功半，可是又有改良縣政的企圖，終使鄉村建設者踏入了縣政改革的道路。至1936年時，晏陽初的平教會已經在廣西、廣東、湖南及定縣四地經營。[14]

緣此，地方自治的實驗運動最初是由民間發動，引起政府的實驗，再由政府的實驗，增加民間的興趣。[15]最後彙集成基層政治實驗的高峰。實驗縣實施的結果，像廣西的三位一體制、江寧蘭谿等地將行政與自治層級減少，影響了新縣制的的層級改革。雖然對於實驗縣的評價各方不一，但從實驗縣的風行可窺視當時對於基層建設的重視。從「最初僅站在學術及私人團體的立場去研究實驗，以期改進整個的農村生活，從工作中找教育的內容。」但是根據在定縣工作數年的經驗，確感到「由學術立場去建設鄉村是從下而上的工作，是基礎實驗的工作」;「如欲將研究所得推廣出去，則非屈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機構不可」，透過政府的力量積極將研究實驗的結果推到民間去。[16]

如前述，不論是深耕地方有成的新桂系，或者苦思如何強化地方的國民政府，鄉村建設派都是兩者請益的對象。平教總會因各省的急迫需求，前往各省協助與交流。如江西省三地、河南省宛西鄉、江蘇省江寧實驗縣、浙江蘭谿實驗縣、山東鄒平及陝西華縣等地。

定縣實驗縣的成功，讓晏陽初與平教會受到矚目。1929年李宗

---

[14] 李孝悌，〈平教會與河北定縣的鄉村建設運動（民國15年—民國25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99-101。

[15] 李宗黃，《中國地方自治總論》（臺北：中央地方自治學會，1954），159；張俊顯，《新縣制之研究》，45-47。

[16] 晏陽初，〈在二十四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上的講話〉，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1卷，438-440。

airiti

仁邀請平教總會南下辦理軍中平民教育。1931年李宗仁白崇禧致力廣西建設時，也邀請平教總會協助。1932年時李宗仁等人多次與晏陽初團隊多次會談，提供平教總會根據定縣縣單位實驗經驗，進行省單位工作的機會，兩者分別就社會、教育、軍事及政治方向努力。廣西省政府提供經費設立教育研究所，由平教總會高級人員主持管理，與民團地區工作緊密結合。[17]1936年李宗仁因平教總會建議成立設計委員會。1936年10月晏陽初受邀為四川省政府設計委員會副委長，其在「四川省政府設計委員會」成立大會演講「如何建設新四川」，即言擔負此職位，非憑藉學識能力，而是其十餘年的平教工作，與各地方政府或社會學術團體，發生關係者至多。[18]又言：「四川省當局勵精圖治，希望甚切，其所以找著平教會者，因有認識平教會有鮮明的主張，有事實的表現，有實幹的精神，有十五年的歷史」，「沒有政治背景，僅憑一班書呆子，赤手空拳，掙扎了十五年，獲得一些救國新民的辦法，本著學術的立場長期的研究，很想藉著政治加以實驗」，「四川當局希望我們設計建設文化的經濟的四川，若不完成此類責任」，不僅是「四川省的罪人而且是中國的大罪人」。[19]晏陽初與其平教會自省地位與責任之重要，開始了四川鄉村基層建設之路。

四、從文化教育的鄉村建設到新縣制的鄉鎮控制

國民政府的地方自治團體不只為一政治組織，同時也是一經濟

[17] 晏陽初，〈在歡送陳筑山先生赴桂大會上的講話〉，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1卷，440-442。

[18] 晏陽初，〈如何建設新四川—在四川省政府設計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演〉，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1卷，472。

[19] 晏陽初，〈對在川同志之勉勵詞〉，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1卷，482-483。

airiti

組織。在政治與經濟共同的組織團體原則下，將管教養衛四項內容完全納入基層的政治機構中。中國農民人口占約百分之八十，要推動新縣制就需要從最基本的地方開始，要喚起農民，發動農民的力量，各種政治設施不得不注重農民的政治利益與經濟生活。[20]日軍的進逼，讓國民政府積極建設四川省，以為將來中日戰爭的根據地。1935年蔣中正即電促晏陽初在四川推行平民教育鄉村改造工作，同時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也急電晏陽初協助四川省的建設工作，晏陽初終回到其家鄉貢獻其學。

晏陽初出生於四川省巴中縣，本就與四川有淵源，隨著政府請其擔任四川省政府組織設計委員會副委員長，可推測除了鄉村建設的經驗，也有其鄉土淵源。1935年，晏陽初受蔣中正與劉湘邀請的誠意感動，[21]正式與劉湘等四川人士進行函電往來研討，再經與平教總會的多次會議商榷後，認為此可能是「省單位實驗」的機會，提出建設四川諸多建議與看法。為了推行「省單位實驗」，建議省政府應設立「設計委員會」，由政府負責人與「平教總會」代表共同組成，主持全省建設工作的一切設計，並監督其進行。再執行建設工作時，所有省屬各部門都要全體操作運行。至於人才訓練，省內各大學、職業學校、中學都應動員。這些建議後來都獲得劉湘與四川各界領袖同意，晏陽初也擔任了四川省設計委員會副主委一職，擔負全省社會建設的總參謀責任。負責設計全權，並且監督各項計畫切實推行。晏陽初在四川所到之處獲得熱烈迴響，深信四川是充滿潛力的理想地區。1936年6月，「平教總會」正式南遷至湖南長沙市，就近從事湘川兩省的工作。自此鄉村建設的實驗不再僅限於定縣，並且

[20] 李宗黃，《新縣制之理論與實際》（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155。
[21] 晏陽初，〈在第六次大周會上的講話〉，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1卷，447。

airiti

為國內訓練鄉村建設人才的場所。[22]

1936年初，晏陽初與成都與省政當局商定四川建設的步驟。四川省政府組織設計委員會，除省政府各委員為當然委員，另聘四川、華西、重慶三大學校長及平教總會成員為委員。下設地方自治、教育、農業及衛生專門委員會。延攬當地專門人才與專家分別展其所長，做各方面的設計。[23]設計委員會職責在根據中央及各省之各項政策，擬製省內各項之具體方案；審議省政府交議之各項方案；研究並視察各項政務有關係技術之設施；辦理省政府核准試辦之各種表燈設計；計畫省政府各廳處工作進行上連繫與調查。四川省設計委員會是由平教總會負責組織，社會調查工作也是由平教總會主持。[24]

1936年10月四川省政府設計委員會正式成立，身為同鄉人的副主委晏陽初應邀演講指陳如何建設新四川，即言四川省政府組織設計委員會的工作進程應先從調查入手，建設要從基礎上做起，先從農村改造入手。並須符合國情與省情。[25]四川省設計委員會開始社會調查選定了新都縣進行集中調查，以新都縣為未來實驗縣作假定。因此晏陽初向四川省政府推建陳開泗為設計委員會委員，及預定陳擔任新都實驗縣縣長。1937年4月陳開泗就任新都實驗縣縣長，首先調整各級行政組織，裁局設科，事權集中在縣政府。裁撤區署，將聯保辦公室改為鄉鎮公所。又整編保甲，規定5戶至15戶為一甲，5甲到15甲為一保。每保少則一百餘戶，多至二百戶以上。如此編組便於行政監督也減少行政經費，1940年頒定的「縣各級組織綱要」

---

22 吳相湘編著，《晏陽初傳——為全球鄉村改造奮鬥六十年》(臺北：時報文化，1981)，362-364。

23 晏陽初，〈在長沙同仁會上關於四川工作的講話〉，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1卷，470-471。

24 吳相湘編著，《晏陽初傳——為全球鄉村改造奮鬥六十年》，377-382。

25 晏陽初，〈如何建設新四川——在四川省政府設計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演〉，473。

airiti

（新縣制）即採用這個概念。再者整頓公安清丈土地，土地歸戶完成後，依據編造田賦賦稅籍冊，革新納稅風氣；另外調整鄉保學校區劃創制，新縣制也採用此創制並通行全國。[26]

1940年中央政府宣布實行新縣制，由四川省先實施新縣制，樹立全國改革縣政的先聲。因此，早在1938年8月1日，中央政府任命陳筑山為四川省政府秘書長，爾後陳筑山將原在定縣實驗縣的經驗，推展運用到四川省政府。晏陽初在縣單位的實驗研究經驗轉化到省單位的實驗，經由前述之保甲制度、學校制度等實驗整合，使四川省得能順利首先開展新縣制，完成新縣制的目標工作：裁撤區署、改組鄉鎮公所、完成鄉鎮中心小學及鄉鎮壯丁隊等工作，協助四川省先實施新縣制。

五、結語

鄉村建設與新縣制有其淵源脈絡可循。鄉村建設從知識份子有感救國與農村問題解決是不可分割的。為解決農村問題，如教育、貧窮與衛生等問題，遂開始投入鄉村建設。鄉村建設的內容主要是在解決農村的教育與貧窮問題，如農村經濟中的農事、造林、農村合作、種田會等。[27]知識份子投入鄉村建設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成為一股風潮，各地皆有人響應。這樣的風潮在國民政府完成北伐進入訓政時期時，面臨到基層地方管理問題時，也就受到注目。兩者在互補互惠的共識下，有些鄉村有建設成果的如定縣開始與政府合作，而投入實驗縣的努力。這樣的合作也就間接影響了1939年的新

[26] 吳相湘編著，《晏陽初傳——為全球鄉村改造奮鬥六十年》，384-389。

[27] 〈安徽和縣烏江鄉村建設事業概況〉，《民國叢書第四編》（上海：上海書店，1992），社會科學總類 15 鄉村建設實驗 第一集，104。

airiti

縣制的改革內容，如各鄉鎮皆設學校，以及農業改良試驗所等。

隨著新縣制推行後，政府對於縣以下的政治控制更為嚴密，在各地皆經費有限之下，無固定之財源的鄉村建設派也更無立足之力。鄉鎮間經由保甲與國家勢力的動員法規，政府透過鄉鎮造產從事另一層面的組織與動員，鄉村建設所要施展的目標皆有政府的介入，漸漸式微。

當鄉村建設與政府合作後，鄉村改造工作相對更為積極，鄉鎮民的生活也逐漸複雜了，組織與紀律也就更加嚴密。一方面希冀用教育力量改變人民的生活習慣，一方面要用政治力量組織動員。教育本質在啟發個人內化的自發性，組織動員則是被動訓練的結果，兩者若相輔相成，不啻如虎添翼，然而在抗戰時期，各種組織動員，反而讓原本單純的農村生活複雜化。對政府而言雖然控制等方式皆組織化，對地方而言卻是破壞了其原有的生活型態。

airiti

徵引書目

（一） 史料、史料彙編

1. 〈安徽和縣烏江鄉村建設事業概況〉，《民國叢書第四編》，社會科學總類 15 鄉村建設實驗 第一集，上海：上海書店，1992，104。
2. 〈定縣實驗區工作概略〉，《民國叢書第四編》，社會科學總類 16 鄉村建設實驗 第三集，上海：上海書店，1992，225-261。
3. 〈新縣制之實施〉（中央電台 1940 年 2 月 23 日廣播稿），《新縣制之理論與實際》，收入張研、孫燕京編著，《民國史料叢刊》，第 140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13。
4. 《民國叢書第四編》，社會科學總類 15 鄉村建設實驗第一集，上海：上海書店，1992。
5. 《民國叢書第四編》，社會科學總類 16 鄉村建設實驗第三集，上海：上海書店，1992。
6. 《定縣實驗工作提要》，出版地不詳：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4。
7. 張研、孫燕京編著，《民國史料叢刊》，第 140 冊、第 68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8. 陳序經，〈鄉村建設運動的史略〉，《鄉村建設運動》，收入張研、孫燕京編著，《民國史料叢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二） 文集

1. 晏陽初，《晏陽初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2. 晏陽初，〈 平民教育促進會工作演進的幾個階段〉，收入氏著，《晏陽

airiti

初全集》，第 1 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3. 晏陽初，〈十年來的中國鄉村建設〉，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 1 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4. 晏陽初，〈在二十四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上的講話〉，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 1 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5. 晏陽初，〈在長沙同仁會上關於四川工作的講話〉，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 1 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6. 晏陽初，〈在第六次大周會上的講話〉，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 1 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7. 晏陽初，〈在歡送陳筑山先生赴桂大會上的講話〉，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 1 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8. 晏陽初，〈如何建設新四川——在四川省政府設計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演〉，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 1 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9. 晏陽初，〈對在川同志之勉勵詞〉，收入氏著，《晏陽初全集》，第 1 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三）專書

1. 吳相湘編著，《晏陽初傳——為全球鄉村改造奮鬥六十年》，臺北：時報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81。
2. 李宗黃，《中國地方自治總論》，臺北：中央地方自治學會，1954。
3. 李宗黃，《新縣制之理論與實際》，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4. 張俊顯，《新縣制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88。
5. 黃紹竑，《五十回憶》，上海：上海世界書局，1945。

airiti

（四）論文

1. 李孝悌，〈平教會與河北定縣的鄉村建設運動（民國 15 年－民國 25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五）報紙

1. 〈定縣之平教與村治運動〉，《大公報》（上海），1930 年 1 月 10 日，2 版。

airiti

The Origin of Township Productive Enterpris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1940s

Hsu, Hui-We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prevailed in the 1930s, and the township productive enterprise was the resul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ounty system in 1939.

Regardless whether it is the the new Guangxi Clique that is successful in local o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is thinking hard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local area, both parties turn to the township productive enterprise for adv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wh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romoted local construction, it also worked with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faction, and other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of the 1930s and the township productive enterprise, and to compare the origi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Keywords: Rural Reconstruction, Township Productive Enterprises